

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导师

史华慈先生和费正清先生

他们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目摇摇录

序言 轱谣

鸣谢 轱谣

第一部分摇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摇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轱袁

第一章摇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 轱源瑶

第二部分摇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摇人们经历的去 轱苑

第二章摇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轱苑

第三章摇降神附体 轱员

第四章摇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轱元员

第五章摇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轱元怨

第六章摇死亡 轱源瑶

第三部分摇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论摇被神话化的过去 轱员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插图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第七章 摇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转页远

第八章 摇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转页怨

第九章 摇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 转页怨

结论 转页圆

注释 转页缘

文献目录 转页怨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19~~1949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 ~~19~~1949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摇东

1985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哲学家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评论历史学家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写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义和团~~义和团发生于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来考察这个问题。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我刚开始研究历史时的看法与现在的看法大不相同。我以前一直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我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但是,关于解释历史的过程和牵涉的种种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比以前复杂得多。我现在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就抽象的层面而言,义和团起义是清朝(~~光绪~~光绪末年历史画卷中的重要篇章。它是~~义和团~~义和团世纪中叶的大起义与~~义和团~~义和团的辛亥革命之间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义和团民多是因~~义和团~~义和团世纪~~义和团~~义和团年代初以来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而变得赤贫的农村青少年。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义和团起义是对世纪之交中国农业秩序失衡状况的集中反映。这种失衡——在清帝国的许多地方表现为大规模的民众骚乱——也反映在义和团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义和团~~义和团的降神附体仪式和法术活动中。义和团运动的排外性——~~义和团~~义和团最突出地表现在义和团对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进攻中——~~义和团~~义和团给中外关系带来了严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外国的军事干涉和中

xii 国对列强的宣战。最后，使馆之围被解除，清廷逃至西安，洋人攻占北京，大获全胜的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清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 19 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清政府（小心谨慎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措施。芮玛丽在考察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篇文章的开头明确指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 1911 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①综合义和团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来看，芮玛丽之言不足为奇。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事件，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神话，尽管这些神话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在 19 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义和团的言行使人联想到危险、排外、非理性和野蛮等”。^②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也抱有这种负面的看法，并增加了“迷信”和“落后”两条。但是，到了 1911 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高潮阶段，虽然许多西方人试图以“义和团主义”的复活为说辞来诋毁中国的民族主义，但中国的革命者已开始正面评价甚至美化义和团，说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视义和团为反对外来侵略的勇敢战士的这种正面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和美国的一些华人）中达到了顶峰，而同一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许多西方人）则旧事重提，说义和团是狂热、野蛮的排外分子。他们还把这种标签贴在了红卫兵身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义和团的同盟军红灯照也大加赞扬，尤其是称赞她们向旧社会妇女的从属地位发起了挑战。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两条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当我们重新塑造时，过

去——更确切些说,是人们经历的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历史学家为了说明和解释而把过去整理成“事件”叙述时,或者当神话制造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从过去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时,直接创造过去的人的经验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保罗·维恩认为,事件本身与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观察不会完全一致,是历史学家发掘和梳理了他要叙述的事件的有关证据和文献。^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对理解历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历史学家也是神话制造者吗?如果我们要分析和解释一个事件,要把它分解成若干个小事件和个人的经历——如战壕里乏味的生活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不是雄伟壮观的战斗序列,那么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只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资料吗?或者更乐观些说,当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过去或神话制造者利用过去的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时,我们得到的是更接近于“真正的过去”的史著吗?

这些问题没有涵盖我在本书中关注的所有方面。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历史学家后来写的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故事”,他们知道事情的结果,对整个事件有全方位的了解,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义和团运动本身,而且是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第二部分考察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为了生存而加入义和团的中国农村青少年,在该运动的高潮阶段散处华北平原各地的忧心忡忡的外国传教士,1900年夏初天津之战期间被困在天津的中国人和洋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简言之,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对整个“事件”没有全方位的了解,因而,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与事后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根本不同。)第三部分考察在19世纪的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和“义和团主义”的种种神话——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的主旨不在于解释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从义和团的历史中汲取能量,获得政治或宣传方面的好处。^④

我考察(和比较)意识的这些不同方面的目的,在于说明历史研究工作是难以尽善尽美的,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历史(在某种

XIV 意义上说,它是确定的、不变的)与后来的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它似乎一直在变)之间的差异。这与广为人知的“罗生门”效应大为不同。^⑤至少在被吸收进英语以后,“罗生门”指的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即对“真相”的不同看法,这取决于他们与这件事的关系。本书考察的了解过去的不同途径当然包含了观点和视角的不同。但是,这些途径的内涵超出了这一范围,触及到了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不同。过去的经历者不可能知道历史学家知道的过去。神话制造者虽然与历史学家一样知道事情的结果,但他们无意于了解历史的创造者经历的历史。换言之,了解历史的这三条途径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也制造神话,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也完全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写入历史),虽然如此,它们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更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

虽然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但我也希望本书能够引起那些关注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 1900 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本书最长的一个部分)中,我探究了 1900 年华北民众经历之事——干旱、降神附体、法术与妇女污秽败法、谣言、死亡等——的若干方面,我的探究比描写义和团的许多一般性著作要深入得多。在此过程中,我常把自己当做“人种志专家”,试着以同情的态度去了解普通人(如义和团、非义和团的中国人及传教士)是“怎样理解世界”^⑥的。我还经常从这个世界回过头去观察和解释过去发生之事,我采用的方法是我正在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所不知道的。

XV 第三部分是针对与上面有关的另外一种问题而展开的。在这个部分中,我叙述了中国人对义和团加以神话化的情况。就本书的广泛目标而言,此项叙述的目的在于从总体上说明神话化的过程。但是,每一个历史事件在该国后来的历史上都有不同的意

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 20 世纪中国人追求既接受又排斥西方文化的现代自我认同的痛苦历程中,义和团扮演了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意义的角色。

现在谈一谈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有些是自己做出的,有些是环境造成的。其中一个选择与我使用的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有关。正如某些读者已经明白的那样,我有时候从技术的层面使用这个词,用以特指历史学家重塑过去的正式过程。虽然没有人限制历史学家考察和重塑人们经历的去或被人们神话化的过去(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所做的),但从第一种意义上说,历史显然有别于经历和神话。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本书的书名中,我使用的历史一词含义广泛,较少技术层面的考虑,涵盖了认知历史的各种途径,包括经历和神话在内。我希望读者能通过上下文了解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究竟是第一种含义还是第二种含义。

虽然按照年代顺序来看,本书中关于经历的部分也许应该放在前面,因为过去是先被人们经历,后来才被重塑或神话化的,但是,我却把作为事件的历史放在了前面。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其二,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在逻辑上或认识论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虽然专业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恳请对义和团事件有所了解的读者不要按照本书各部分的排列顺序来阅读,而是按照你们喜欢的任何顺序来阅读。

xvi

我的另外一个选择与本书关于经历的这一部分有关。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注重的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潮阶段(1900年春夏,该

撬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运动波及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了满洲和内蒙古）而对 1900 年之前该运动的情况关注甚少——1900 年之前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尚处在起始阶段。我做此选择的原因有三。第一，这个部分——共有五章，如干旱、降神附体等——所述的主要现象在 1900 年春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正因为如此，相关的中外档案和文献比 1900 年以前更为丰富多样。^⑦第三，关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初起时的情况，我们已有一部极为出色的英文专著：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虽然本书的主旨与周书的主旨根本不同，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到义和团运动的其他阶段，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首先要感谢约翰·伊斯雷尔、欧文·沙伊纳、杰弗里·沃塞斯特罗姆和马德琳·泽林,他们都仔细通读了书稿,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建议。我要感谢杜赞奇、洪长泰、迈克尔·亨特、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劳拉·麦克丹尼尔、韩书瑞、詹姆斯·沃森和鲁比·沃森,他们分别对本书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我在科尔盖特、哈佛和韦斯利大学演讲后听到的评论和参加 1984年 6月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研讨会的学者给我提出的建议,都使我获益匪浅。

在本项研究开始之初,邹明德帮助我从中国获得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杂志上的极有价值的文章。邹先生还介绍我认识了上海图书馆的祝均宙,祝为我搜集了不易见到的“文革”政治漫画。在我开始查阅有关义和团的史料时,盖尔·赫斯哈特就提醒我,天津存有未出版的义和团口述史资料。由于陈振江和南开大学其他学者的慷慨相助,1984年我前往中国时复印了其中的许多资料。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我与山东大学路遥教授的谈话也使我获益匪浅,他是中国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权威历史学家之一。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档案管理工作者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马撒·伦德·斯莫利和琼·砸·达菲、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

xiii 历史中心私人档案原管理员迈克尔·米勒。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管理员们为我查阅美部会档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我既感到愉快，又收获良多。胡佛总统图书馆的戴尔·悦·迈耶总是耐心地回答我的问询，为我提供了赫伯特·胡佛和卢·胡佛撰写或收集的许多非常有用的资料——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两位正好在天津。

本书中的许多插图资料是由利萨·科恩翻拍复制的，詹姆斯·埃维亚、鲁道夫·瓦格纳和凯瑟琳·叶为插图资料提出了许多建议，罗伯特·福格特绘制了地图，范达人向我讲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活动的看法，理查德·马德森慷慨地让我参考了他在河北省天主教家庭中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及研究成果，孔祥吉、马静恒和马惟一帮助我理解特别难懂的中文词汇和短语，在此，谨向上述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内奥玛·厄珀姆·斯科特允许我引用她父亲奥斯卡·厄珀姆神父的日记，也感谢助我获得此项许可的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管理员艾米·坎廷。我还要感谢亚洲研究协会允许我引用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1984~~1985年 圆月）上的一篇文章。

与我无数次共进晚餐的希拉·莱文一直给予我热情支持，与我无数次共进午餐的丹尼尔·利特尔经常帮助我理清思路，特别是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老朋友丹尼尔·斯特恩多年来不时地和我聚谈，与我交换看法（他的研究领域同我的研究领域虽然不是毫无关系，但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我的观点开始形成之际，另一位老朋友艾伦·莱伯维茨就如何最终将书写成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凯特·威顿伯格是通读本书书稿的一个人。她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当本书被出版社接受时，她又全权负责本书的出版工作，在此谨向她表示诚挚的感谢。在哥伦比亚，我还要感谢罗伊·托马斯，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超的技巧编校了书稿。

最后，谨向从一开始就对本书的写作表示信任并给予慷慨资助的韦斯利学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表示感谢。

第一部分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 摇摇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猿

1953年猿月,托妮奖章管理委员会认定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音乐喜剧《杰罗姆·罗宾斯的百老汇》不是旧剧“重演”,所以应该获得“最佳戏剧”的奖章。该委员会内部经过激烈争吵后作出的这项决定有经济方面的重要含义,因为该剧的票房收入虽然不俗,但排演成本太高,获得最佳戏剧的奖章可使该剧多增加数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委员会内部争论的焦点(除经济方面的考虑外)在于,虽然该剧作为一个完整的剧目从未在百老汇上演过,但其基本内容却似曾相识。^①因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剧到底是新剧初演还是旧剧重演?

托妮奖章管理委员会解决的问题也许可以用来比附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是旧剧重演还是新剧初演?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不是历史学家的人们很可能会选择前一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做的就是准确地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其成果就不是历史。

本书所持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不论同人们的直观感觉多么不相符合,我都认为(我相信多数正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会赞同我的观点),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

播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历史学家叙事的程序(即对历史的叙事化处理)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的源叙事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结果依然如此。

在进一步考察历史学家如何使“过去”变成“历史”之前,我先简要地阐述一下刚才提出的叙事化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与我们怎样确定“历史”(就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而言)同“真实”(就人们创造和直接经历的历史而言)之间的关系有关。此问题不仅在历史学家当中引起了争论,而且在哲学家和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文艺理论家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某些人(声名最著者为海登·怀特和保罗·里克尔)的观点是,从本质上看,历史与真实之间毫无延续性可言。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在叙事,是在讲故事,而“真实”却不同。因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把一些构想或结构强加到了历史上。另外一些人(在他们当中,我发现戴维·卡尔的解释最清晰,也最有说服力)则认为,“叙事结构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中,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无关”。在卡尔看来,叙事法是历史学家阐释真实的过去的一个基本手段,历史与真实之间(他喻之为“叙事与日常生活”之间)不是没有连续性,而是具有很大的连续性。^②

我个人的看法介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虽然离卡尔的观点稍微近一些。我同意卡尔的这一看法:叙事结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对个人和社区而言,均是如此,因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事化处理本身并不会把人们经历的历史与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割裂开来。然而,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的另外一些特点的确使历史与人们的直接经历之间产生了差异。^③至少,所有的历史著作(即使是最出色的那些)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和浓缩,像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历时数年、波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历史事件可被转化为一本数百页长的史书,人们可以把它拿在手里,花半个小时就可以从头到尾读一遍。

在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中,有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按原样”恢复历史是不可能的。小说中的人物杰弗

里·布雷思韦特说了这样一段话：“书籍告诉人们：她为什么做这件事。生活告诉人们：她做了这件事。书籍是向你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生活就是事情本身。某些人偏爱书籍，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④佩内洛普·莱夫利的《月亮虎》中的主人公克劳迪娅·汉普顿若有所思地说：“当你和我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指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吧？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宇宙乱象，是吧？我们指的是经过整理以后写进书中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时空和人物的善意观察。历史是对过去的解释，而事实是错综复杂的。”^⑤

这两段话表述的实质上是同一个意思：实际经历（布雷思韦特所说的“生活”，汉普顿所说的“事实”）是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而历史（或者“书籍”）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某人可能由于饥饿而参加义和团运动，第二个人可能因为憎恨和畏惧外国人和外国势力而参加该运动，第三个人可能发现参加义和团是向宿敌复仇的良策，第四个人支持义和团可能是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不支持义和团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诸多的动机中找出一些有意义的范式，把特别复杂和混乱的事件清楚而完整地描述出来，且能言之成理。简言之，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

我基本同意上述关于历史学家的作用的说法，但是，我们需要处理好经历和历史之间的悬殊差别所反映出来的过分简单化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人们的实际经历也许是杂乱无章、头绪繁多的，但对经历者而言，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的生活中并非没有混乱和无序，但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却不是杂乱无章的。就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叙事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把经历与叙事联系在一起。我们给自己“讲故事”，使我们的经历变得有意义：个人生平方面的意义而非历史方面的意义。因而，书籍解释生活中发生之事（杰弗里·布雷思韦特语）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生活中，我们也特别需要理解和